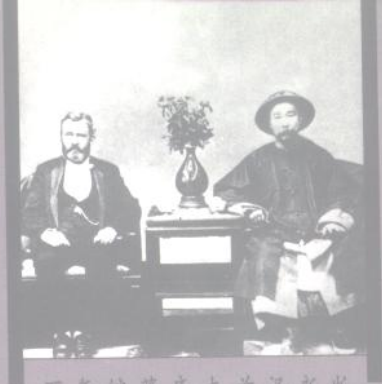


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



百年馆藏库本首译新版

西方的 中华帝国观

WESTERN CONCEPTS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美〕M·G·马森 / 著
杨德山等 / 译

时 事 出 版 社

主 编



101693

0912.5
35

DI26/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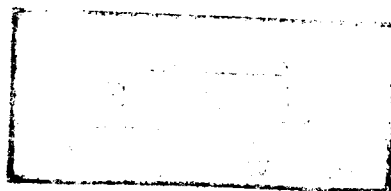
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

西方的中华帝国观

[美] M.G. 马森 著
杨德山等/译



201016934



时事出版社

00010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的中华帝国观 / (美) 马森 (Mason, M. G.) 著; 杨德山译. - 北京: 时事出版社, 1999. 1

(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

ISBN 7-80009-514-2

I. 西… II. ①马… ②杨… III. 社会-评论-中国 IV. D6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8911 号

西方的中华帝国观

WESTERN CONCEPTS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1840—1876

By Mary Gertrude Mason

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编: 100081)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时事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5 字数: 256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8.80 元

出版说明

这是一套介绍西方的中国观的译丛,其作者有的曾在中国居留,有的是深谙中国文化的汉学家,他的或以外人独有的视角和眼光打量、考察着这块神秘的土地,以生动形象的语言记录下他们的观感和惊奇,或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写下有关中国学的学术专著。这些作品在西方轰动一时,而在中国却长期鲜为人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我们希望将本译丛发展成一套囊括西方关于中国的主要著作的大系,以填补中国出版业的空白。

这些著作以各自不同的角度记录了历史的侧面,对于当代人来说,这些都是相其难得的史料,可以使我们较为清晰地回眸历史的原始形貌。总的来说,这些作者对中国是怀有深厚感情的,如《中国乡村生活》、《中国人的特性》的作者明恩溥,是最早建议美国总统退还庚子赔款的人,《穿蓝色长袍的国度》的作者立德夫人,是近代中国反缠足运动的发起人等。当然,有些对中国问题的评说有失允当,有的是出于文化上的隔膜与偏见,有的则是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为其侵略行径开脱。为保持史料原貌,在编辑中未予删除,否则就不是“西方人视野里的中国形象”,而是“中国人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了。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些言辞不代表出版者和译者的观点,
而是谨供读者和研究人员参考,相信大家自会鉴别。

时事出版社

1999 年 1 月

序 言

戴逸

中国被西方所认识并纪之以书，大抵应从《马可·波罗游记》算起；其后的利玛窦更以“西儒”之身份撰写了多种著作，力图在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之间寻找到结合点。在这些著作的影响下，十八世纪的欧洲汉学界充满了对中国社会理想化的描述；与此同时，欧洲的一些启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和亚当·斯密亦开始用新的眼光审视华夏这个古老的文明。有的赞美这一古老文化，以为可成西方的借鉴，有的则鄙视中国，揭示其停滞不前的传统原因。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中国观”逐渐得以形成。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在席卷世界的近代化浪潮中被抛在了后面。于是，国门被坚船利炮轰开，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屈辱时代由此开始。

结束这样一段痛史，迄今已近半个世纪，今世的人们对于那一时代的认识，往往仅限于教科书和一些演义化的影视文艺，而缺少更生动更真实更细致的资料作为参考。事实上，随着当年舰炮而进入中国的，还有大批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外交家等等。这些人在中国居留甚久，对中国文化和社会有着不同程度的了解，当然也有着迥异于国人的视角。他们通过自己的多方观察和体验，分别写出过许多有关中国社会各个侧面的专著，对西方人认识中国产生过巨大作用。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著述一直湮埋于历史的烟尘之中；我们只能从鲁迅、潘光旦等老一辈学人的引用、赞叹和批评里，隐约遥想这些著作当年的影响。

现在，一批青年学人本着重新认知和借鉴西方“中国观”，借以追溯中西文化交流和文明冲突的历史，以便更清晰地了解中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这一目的，从库藏旧版中译出这套丛书，命之为“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这实在是一件

深具意义的事。从首期推出的这一套四种译著来看,这些原著都成书于清末,真实地记录了上个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各层面的状况,并附有大量珍贵的旧照片。总体来看,这些作者对中国还是较有感情的;在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方面也确有贡献。具体而言,他们在中国的居留岁月里,也提出过一些友好和善意的建议,比如主张戒除鸦片,反对缠足,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庚子赔款以及提倡改革教育制度等。

毋庸讳言,由于文化隔膜及未能深入准确地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书中难免存有一定的偏见和错觉。因此,某些仅凭粗浅的认识即信口开河妄作解人的观点,多少便带有自大张狂和民族歧视的痕迹。至于这样一些故意夸大他国族性弊端的微词非议,或者有目的地宣扬宗教思想的传教士腔调,只能昭显出作者的狭隘和时代的局限,对于今天的中华民族——一个雄据于东方,充满自尊、自信和自强的民族,已经丝毫无损,我们已有足够的度量来回顾已为陈迹的一切。

出版编辑这样一套译丛,有选择地引进介绍一批在西方社会影响巨大的有关中国观的经典著作,我以为还有另一层意义,那就是有利于促进国内近代文化史、社会史及民俗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对于拓展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范围和深度也将起重要作用。再者,书中也存有许多善意的批评和中肯的建议,即使百年之后来回顾这些意见,仍具有一定的警醒价值。如果能积累有年,持续不断地编译下去,将是一项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出版工程。我希望这套译丛能够多出一些,出全一些,不企望一次性完成;同时在著作的选择方面下大功夫,争取能集萃最具经典性的作品。从中我们可以审视历史,温故而知新,最终达到提高我们民族素质的目的,正如鲁迅先生当年所警示的那样:“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主编前言

黄兴涛 杨念群

十多年前,当中国再度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时候,钟叔河先生主编了一套《走向世界丛书》,旨在展示近代中国人最初步出国门后,对于外部世界的观察和思考。它以深沉的历史感,丰厚的文化内涵,给读书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和温馨的记忆。那无疑是一项功德无量的文化出版工程,至今,我们仍然期待着它还能够有新的延续。

但是,中国融入世界是一个双向流动的过程。中国走向世界,同时也意味着世界走向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一过程中,外来的人们还表现得更为“主动”。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咱们开门走出去,正由于外面有人推门,敲门,撞门,甚至破门跳窗进来。”当中国人远渡重洋,以惊奇的双眼观察世界的时候,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也飘洋过海,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他们用异域人的眼光打量着这块陌生的国土及其生活在这里的芸芸众生,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各种著述,留下了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民族性格等方面之形形色色的观感、研究和评论。无论是从历史研究、民族交往、文化交流,还是中国民族的自我认识等多种角度来看,这些著述都不该是封存于库的资料,而是有待开发、内容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虽然,在那中国人备受欺压的岁月,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著述往往带有程度不同的歧视意味和阴暗色调,但其中也不乏认真观察、深切体会、既具有洞察力又深怀同情心的明智之作。作者或是在中国生活多年的传教士、外交官,或是为清政府所雇佣的官员、教习和科技人员,或是外国在华报刊及西方各大报派驻中国的记者,或是考察、游历中国的作家、学者、律师和商人。其角色种类之繁,观察范围之广、层次之多、内容之细致深入,总体说来均远非同时期观察西方的中国人及其有关著作可比。正是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观察者所写下的为数众多的著作,从而建立起了当时的西方世界里关于中国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又构成今日西方人心中中国形象的历史底版,并反复不断地被现实冲洗出新的照片。

浏览西方人关于近代中国的各种著作,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些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中国的观察记述,确有中国人习焉不察的独特之点。相当一部分是对基层社会的记录,多系亲见亲闻,显得别致细腻,足以成为可补中文记载之阙的正史资料;尤其是对方兴未艾的近代社会史研究,具有不容忽视的史料价值。

当然,西方的中国形象毕竟是西方人自己建构的。他们的眼睛里嵌着自身历史文化的瞳孔,因此对中国的反映有真实的一面,也难免有变形、歪曲的一面;有受其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左右,优先摄取或夸大反映的部分,也有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盲点”。甚至还会有意无意地借中国这壶“老酒”,去浇他们自己心中的“块垒”。在这种情况下,其所记所述、所议所论,也就只有文化传播的意义了。

认识一个民族及其文化是一件复杂而长期的事情。无论

是认识者还是被认识的对象,都会受到历史和现实因素的种种制约,且自身也并非一成不变。连西方学者自己也感慨,在西方人眼里,中国及其文化就像一条“变色龙”一样,总在不断地变化着(见英国汉学家雷蒙·道森著《中国变色龙》)。19世纪中叶以后至20世纪前叶,是西方中国观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此时西方的中国形象已不再像18世纪时那样美妙,令中国人揽镜自照之下,爽心悦目之感油然而生。而是观之不免既惭且愤,由此生奋发图强、赶超雪耻之念。如今,中国人的“汉唐气魄”正在逐渐恢复,坦承这种形象变化乃是西方认识中国逐渐深化的表现,或至少是其认识中国走向深化的必经过程,大概不会太显唐突。其实,我们怎样看待它并非至关重要,最重要的在于,它是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一种曾影响中西交往且至今仍影响着这一交往的历史文化因子。大凡健全自信的民族都是会正视且研究这一历史现象的。

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好比是一面历史的镜子,照一照这面西洋镜,从中领略生活于中国本土意识之外的人们对自己的看法,了解我们在西方的形象变迁史,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反省和完善自身的民族性格;在现代化建设和国际交往中,增强自我意识,更好地进行自我定位。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借别人的眼光加深自知之明”的意思。

目前,国内学术界比较重视对西方汉学专门研究成果的译述。其中,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海外汉学丛书》,是较有影响的两种。它们向国人介绍了不少当代西方和日本一流的汉学研究著作,资为国内学者学术研究的借镜。而我们这套丛书,则主要选择19

世纪中国国门被打开后,来华西人综合记述中国社会政治制度,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民族性格等具“宏观性”而又不那么古板学究气的各种著述。我们的选择标准是:它们曾经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对西方人的“中国观”产生过一定影响;作者眼光独具,经历丰富,观察细腻,议论有味,总之生动可读。与此同时,丛书也包括了一些后来的西方学者对欧美“中国观”予以分析研究的总结性著述。但愿这套丛书对国人了解近代中国社会和西方人的中国观,能够有所裨益。

1997.12

目录

前言/1

1. 引言/6

2. 资料概览/31

3. 西方的中华帝国观/92

4. 闭关自守的崩溃/109

5. 移民/129

6. 鸦片/144

7. 商业和政治利益/164

8. 中国社会/196

9. 语言和文学/254

10. 哲学和宗教/285

11. 音乐和艺术/332

12. 科学/348

结语/362

译后记/376

前言

这部专著旨在阐述 1840 年到 1876 年期间西方人关于中国国家和中国人的观念。1840 年爆发的第一次中英战争（Anglo-Chinese War）翻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同时它也是中西关系的转折点。这场战争是结束中国与世隔绝和高傲自大的开端。由于 1842 年中国部分地对外开放，欧洲人有了获取有关这个国家第一手资料的更多机会。1840 年也是西方人旧的中国观念瓦解和新的认识逐渐形成的一个转折点，这种新认识是由 19 世纪的零碎观念慢慢积累起来的。19 世纪 70 年代之前，有关中国的一般性的描述著作表明，外国人对于这个国家有了更准确的资料，对这个帝国及其人民不再发表一些较为荒唐的言论。尽管在 1876 年之前，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有了显著的增进，但是，这个时间仍可以作为这项研究工作公认的界限，这之后，欧洲人或者美

国人对中国的兴趣并没有绝对性的变化。迄今为止，传教士们依然用颇为相同的方法持之以恒地继续从事着他们的活动。在整个 19 世纪，贸易商和资本家扩大和增加了他们的在华利益。特别是随着帝国主义在英国和法国的复兴，西方的政治家、贸易家、商业家认识到了在中国进行投资和开辟市场的重要性。

这部专著不是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说明性研究。我的主要兴趣在于展示中国在西方思想中扮演的角色，阐明欧洲人对东方人和他们的国家所持的观念。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正确与否同这项专题研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在后面的个案研究中，我还是引用了这方面的许多例证。

因此，这部专著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资料摘录，其中包括了不少杂乱无章的作者的荒诞不经的概括，也有许多精明睿智的传教士、学者、领事官员、观光游客的记录资料。用引号来标明他们的观念是不可能的。这些观点在本著作中只是作了一般性的概括，而没有去直接引述，但是在本著作的注解和一般正文中，我都引用了这些叙述者的名字。

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采取了现实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方法。文中尽一切可能对每个讨论的题目作了时代性的阐述，力图揭示不同概念在同一时期的逐渐变化。追寻任何一个有关中国的正确观念在传播方面的进展是异常困难的，因为描述这一进展的作者们有不同的知识教养、生活背景、认识标准和利益关系。这部专著是部有趣的混合物。这当中，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通俗性著作、表相性研究、偶然性记述和学术性研究、准确系统的资料记录等

等，同时并存。

通过对文字资料的概览，我发现西方人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怀有兴趣，特别是对其知识的奇特性感兴趣。在这些著述中，强调中国社会习俗的独特性和奇异性的内容占据了很大部分。不少西方人对中国的商业和工业投以关注，而传教士们则对中国的哲学和宗教情有独钟。

由于这一时期西方有关中国问题的文字材料出版得很多，所以我在资料的使用上进行一定的选择是绝对必要的。我已经阅读了不少普通的著述和游记。尽管我不能查阅全部的期刊和文献，但还是查看了许多主要的期刊杂志。我没有去翻阅报纸，尽管它们给人们提供了西方与东方往来的船舶总量、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以及其他问题的丰富材料，但是，它们极少报道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认识。尽管我没有去查阅这一时期的官方报纸，然而，有关记述政治家们在鸦片问题上所持观念的“英国议院议事录的议会辩论状”（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是一份重要的材料，《加利福尼亚立法杂志》（Journals of the California Legislature）也给我提供了有关美国对中国移民所持态度的资料。

我希望出版一部与本著作编纂在一起的有4 000多个条目的著作目录^①。它将包括一般描述著作、游记、中国文献的译作、供西方学者使用的中文语法和词典、刊登在一般期刊和学术出版物上的文章，还有从1840年到1876年之间的各种文字材料。

^① 因本书内容及注解已基本涉及这些条目，故书后不再附译这些目录——译者注

本书的研究工作大部分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the Library of Columbia University)、纽约公共图书馆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康奈尔大学华森资料中心 (the Wason Collection Cornell University)、马萨诸塞州塞伦艾色克斯研究院 (the Essex Institute Salem Massachastte) 进行的。我还在诸如哈佛大学的贝克图书馆 (Baker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波士顿公共图书馆 (the Boston Public Library)、国会图书馆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以及教会研究图书馆 (the Mission Research Library)、神学联合会图书馆 (the Library Union Checological Seminary) 一类的其他图书馆查阅了资料, 对这些图书馆的全体工作人员, 我谨致谢忱。

我在已故威廉姆·谢福德 (William R. Shepherd) 教授指导的研究班研习时已经开始了这项研究工作, 非常感谢他在本书的资料分类、大纲拟定上所给予的帮助。在 1934 年 6 月 7 日, 谢福德教授去世之后, 詹姆斯·T·夏特威尔 (James T·Shotwell) 教授对这项工作给予了帮助, 我对夏特威尔教授的热情鼓励和珍贵批评表示感谢。我还要对莱登大学 (University of Leyden) 的 J·T·L·杜文达克教授 (Duyvendak) 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汉语访问教授表示谢意, 他们所提的批评和建议对这项研究工作的改进起了难以估价的作用。中文系的蓓克 (C.H.Peake) 教授在本书的内容和体裁上也提出了许多令我欣赏的很好的建议。

我也非常感谢英文系的阿瑟·克里斯蒂 (Auther Christy) 博士, 他阅读了本书初始阶段的部分材料, 中文系的古德里奇 (L.C.Goodrich) 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参考阅览室的图书管理员玛姬 (I.G.Mudge) 小姐, 还有国会

图书馆的胡迈尔 (A.W.Hummel) 博士, 对本书都曾提出了很有帮助的建议。

M.G. 马森

1938 年 6 月 20 日